

Xueshu Bianqian yu Jindai Wenxue
de Zhongguo Xiangxiang



学术变迁与 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

李青果◎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学术变迁与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

李青果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变迁与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李青果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306 - 04399 - 3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717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陈 珂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刘丽丽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10 印张 25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新史学”与历史小说的中国图景	(8)
第一节 想象空间的开创：《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 ——一个经典的个案	(10)
一、把“小说”当做“历史”教科书	(11)
二、链接“文”、“史”的“书法”	(19)
三、“想象空间”的开创	(23)
第二节 历史小说：以“小说”代替“史记”	(30)
一、载体转移：从“史学”转向“文学”	(31)
二、载体选定：以“小说”代替“史记” 观念的确立	(47)
三、重心调整：以描写“今社会史”为 历史小说	(57)
第三节 衰亡，转折，觉悟 ——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 到《孽海花》	(66)
一、衰亡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68)
二、转折史：《文明小史》	(76)
三、觉悟史：《孽海花》	(88)

第二章 哲学的情感转向：写情与国家 (108)

第一节 顺欲与正情：清代“情感哲学”

的理论张力 (109)

一、顺欲：中国哲学的情感转向 (110)

二、正情：写情小说的观念辨证 (117)

第二节 情感·道德·国家

——吴趼人《恨海》及其周边 (125)

一、“固有之道德”与“新时代” (125)

二、为写情立法：言“情之正” (132)

三、以恢复“中国常经”再造“中国性” (137)

第三节 情感·革命·国家

——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

及其周边 (140)

一、从《玉梨魂》到《雪鸿泪史》 (140)

二、“男女”与“英雄” (143)

三、写情之“惧”：自我改写与周边对话 (150)

四、地方传统与民族主义 (157)

第三章 发现“新世界”：新史地学与海外诗歌 (161)

第一节 西方史地学的传入与中国新“世界观”的形成

——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

为例 (163)

一、新世界“史地”知识 (165)

二、新世界诗文“想象” (172)

第二节 “揽万国华实药中国之病”：康有为

的海外诗歌 (178)

一、述国政，陈风俗：从学变到诗变 (180)

二、“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	(186)
第三节 走进“新世界”：黄遵宪的海外诗歌	(196)
一、《日本杂事诗》：“观国情，纪风俗”	(198)
二、《人境庐诗草》：变旧国入新世界	(205)
第四章 十字路口的“国语”探索	(215)
第一节 简易字和“演说”：国语构造与俗语文学	
出场的一个路向	(217)
一、强学与识字：从简易字到俗语	(217)
二、“演说”：从口语到俗语文学	(224)
第二节 白话或文言：清末民初文学语言选择之一 ..	(234)
一、“言文一致”：国语运动与俗语文学史观 ..	(235)
二、“语求近于文”：俗语的“雅化”	
与“标准的白话”文	(244)
第三节 国语或新名词及万国新语：清末民初文学	
语言选择之二	(256)
一、从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到新文体	
之“国语新文学”	(257)
二、中语或西语：国文与“欧化的国语文学”	(271)
结 语	(282)
参考文献	(286)
附 录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	
的发生	(292)

引 言

近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文学转型的动因、过程和功能，前人做了大量深入的探讨。立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政治、中西交通乃至后现代主义）和内部研究（叙事学、文体学），卓见迭出，均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效的阐释系统和描述这一文学转型的文学史观和历史叙述。但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研究视角，比如当时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准备在前人丰硕的研究基础之上，初步探讨近代学术变迁与文学转型的关系和转型文学的功能等问题，尝试为其作出另一路向的文学史描述。

其实，古典中国的学术和文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可以说是“学文一体”、“学者与文人一体”。这个现象由来已久了。自春秋战国天下道术分裂形成诸子百家之后，为重塑社会秩序和收拾世道人心，各学派都提出自家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与之对应的文学主张。儒学、道德之学、墨家学派、法家学派等都表达了自己的语言文学和文艺审美观点，这些文艺主张也是从学术问题出发而又为这些问题的阐发和解决服务的。两汉魏晋佛学传入后情形也差不多，形成了演述阐扬佛学思想的变文俗讲，对推动中国俗语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即以儒学为例，从孔子删诗编诗到诗学的形成，以及诗的地位上升到经而成为《诗经》，它贯彻儒学的性质特别明显。唐宋古文的兴起，其目的也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合为相

辅相成的整体。即使在现代声名狼藉的明清八股文，也主张写作者要学有根柢，写作实学文章。有清一代的桐城古文，提出“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义理、考据两项就涉及学术问题，是当时调和汉学、宋学的一种表现，所谓汉学就是考据，宋学就是义理。直到近世，梁启超批评清代文学不发达，也是归因于其太偏执于考据之学而不重视经世之学的缘故。

对于这些现象，古代文学研究看得比较清楚，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不这样看待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形态发生了走向独立的变化，以及西方分科治学传入后，传统上曾有的那种学术和文学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了，文人和学者也逐渐归属不同的身份和群体。但是，研究近代文学是不是可以延续古典研究的视角？近代文学是从古典文学走出来的，一条腿仍留在古典的世界里，它的目标虽然是纠正传统然后现代化，可它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操作一定有一个与传统保持一致的惯性过程。其思维惯性的一致性，就在于承袭从“经史”之学中谋求“经世”之道，“文以载道”仍然是他们处理文学问题的习惯做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旦进入实际的创作层面，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也会发生对话，进行商榷，从而进行自身的文学性的调整，推进文学性建设和文学观念与创作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把象牙塔中的学术推行到十字街头的文学的过程中，有一个主动化妆表演、寻求自我舞姿身段的程序。这个程序，可称为“文的自觉”，它和“文以载道”相伴相行，甚而因承受了载道之文的压力而要从中挣脱出来，从而形成近代转型文学的种种特点。

晚清以降，国事陵夷。为挽救颓势，几乎与有识之士进行的器物、制度改革同时，“强学保种”也被赋予“再造新国”的重大使命，“国以学立”、“无学则无国”成为一时之共识，甚而形成要以推动学术思潮开展持续的群众运动的强烈冲动。近代学术在纵横两个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从乾嘉考据之学解放出

来，重视经世致用；二是西学东渐，广泛引进西学新知“醒国民之头脑”。此时君学式微，民学始立；旧学沉降，新学上移。推广学术新知实际上担负着启迪民众的任务，而要学术思想有效地发挥启蒙作用，需要使象牙塔中的“学说”转化为十字街头的“俗讲”的媒介。正是这一点，推动了文学的转型，使之成为再造新国的有力手段。文学运动或由新学人为推广其新学说所发起，得到响应和实践；或学术新知的建立为文学创作启发新灵感，贡献新题材，形成学术—文学思潮—创作—语言的展开过程。据史可按的是：

（一）近代作家如黄遵宪、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邓实等大多是学者、批评家、文学运动发起人于一身，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国“学文一体”的传统。随之而起的作家如吴趼人、李伯元、曾朴、黄摩西等，即使没有显赫的学者身份，也是饱读诗书的才人作家，严夏康梁学术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对他们的文学思考和文学创作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二）在观念层面，出现把文学当做推行学术思想的媒介的认识。如梁启超、邱炜萆等学者、批评家认为推动学术实现其启蒙功能，必依赖于“新文学新美术”，把文学视为阐扬学术思想的门径，提出“文学亦学术思想所凭借以表见者”的主张。

（三）在创作层面，一些重要文类被选定为演述学术思想的工具，形成“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或“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于社会”的书写策略和功能诉求。受今文经学影响，“述国政，陈风俗”成为新的诗歌理想。

（四）在语言层面，为解决“中国文字繁难，学界不兴”问题，通俗易懂的俗语、白话从边缘逐渐转移到中心，并与俗文学运动相配合、整合，形成言文一致的“国语”构造运动的各种试验，亦对如何调和“中语”和“西语”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近代文学语言的多种试

验和当时振兴学术、推广新知的使命是互为呼应的，也就是说，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也是与当时的学术问题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总体而言，学术变迁带来了清末民初文学的一次大解放：从乾嘉之学的细密精微中逸出，近代作家敢于大胆地想象、虚构，搬演各种文体的实验；西学东渐引进了西方文学观念，近代作家敢于积极地拿来、扬弃，尝试新的文学创作。而偏向于认同今文经学，近代作家普遍主张文学也要经世致用，担负再造新国的使命。这使近代文学虽不无粗粝之处而又孕育着无限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转型，向着现代发展。

本书所指学术，既包括具体的专门学术，如史学、哲学、史地学等，也指向其时统称的“新学”、“西学”；目的是研究从“学术”到“文学”的进行脉络，揭示在民族主义诉求之下，由此而生成的文学转型路径及其“想象中国”的叙事方法。

一、“新史学”与历史小说的中国图景

梁启超、夏曾佑等以进化论为学理基础，提倡以国史、民史为叙述内容的新史学，目标指向“团结群族”、“进化群治”。他们同时以学问家眼光透视小说家功业，主张创作历史小说，张扬其史学新说，带动了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并且引发对历史小说文体和功能的新的探讨。历史小说的内容逐渐从传统的演义“旧史书”转变到描写“今社会史”，角色从“帝王将相”丰富为“社会大群”，创作方法从本有的“演义”调整到西来的“写实主义”。历史小说进入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结构，其中经典之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孽海花》等，揭示了近代中国从衰亡、转折到觉悟的历史过程，发挥着“有篇小说乃有新世界”的叙事功能。

二、哲学的情感转向：写情与国家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指出清代思潮的一大特征是和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的“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学之根柢在情不在理，证明了他之前提倡主情主义文学和写情小说的学理基础。他还呼应严复、夏曾佑指出的书写“英雄男女”应该起到“争存传种”的作用，主张“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这使近代写情小说形成“顺欲”而又需“正情”的张力。围绕“儿女之情”和“爱国之意”，写情小说先后出现两种写作倾向：一是改良派如吴趼人等重视情感包含的传统道德因素，把写情作为正人心的手段，同时发挥在西风鼓荡之际重铸“中国性”的作用；二是倾向革命的作家如徐枕亚等重视叙述“能为女儿之爱情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把儿女私情转化为献身革命的力量。它们在翻新传统的写情方式之外，也主动地批判着当时流行的狭邪小说，而其情感和道德的冲撞、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现代文学中仍余响不绝。

三、新史地学与海外诗歌

《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新史地学著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观”；海路交通的沟通，使中国诗人有机会走进新世界。新的史地学知识的获得，为诗人的书写活动提供了新背景、新镜像，已被发现的新世界激发了诗人想象中国的崭新方式。同时近代经学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移，引起“诗学”从“道德美刺说”向“述国政，陈风俗”观念偏转。作为新诗学理想的提倡者，康有为、黄遵宪的海外诗歌即以“述国政，陈风俗”为中心，以“揽万国华实药中国之病”为目的，

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他们的诗歌创作包蕴着东西交会的时空意识，记录着“中国”进入“世界”的过程，是古典诗歌在近代突起的异峰。

四、十字路口的“国语”探索

由清末延伸到民国的“国语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强学”的目的，近代以新学代替旧学，以西学淘洗中学，均牵涉知识普及的迫切问题，引发对“学”之载体——语言文字的思考，从而提出铸造言文一致的国语的要求。这种思考处于古今中西交叉的十字结构中：在横的方向上，是正统书面文言被流行的俗语、白话取代和互相改造的过程，激发着俗语新文学的成长；在纵的方向上，是中国语言对外国新语进行翻译、选择和互相磨合的过程，引发着国文和东瀛文体、国语和万国新语的多层次互动。国语运动乃出于变旧国为新国的启蒙冲动，它与近代文学的联系，最终投影到如何再现中国的层面。

要之，本书认为，近代文学的转型与学术变迁具有直接的、重大的联系。学术变迁为文学提供着动力、主题以至于题材、内容，引发近代文学范式的转变。学术中包含的思想脉动、学术思想的现实目的，为文学所吸收并引发文学功能的调整和变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也能动地追求着新的表现方式，争取着独立性，一方面为学术思想所激发，一方面形成着自己的“文学性”。

本书的目的是尝试在一个重要的方式上提出并强调近代学术变迁推动文学发展的观点——当然，在整体文学的转型中这也只是因素之一——讨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试图初步研究近代学术变迁和民族性文学产生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前人也有所涉及，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项：第一，在论述文学想象与

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方面，陈建华先生著有《民族“想象”的魔力：论“小说界革命”与“群治”的关系》（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论述了梁启超以“群治”“新民”为目标的“小说界革命”，如何以“想象”的方式构造新中国的历史与理论问题。第二，在近代学术与近代文学关系方面，刘再华先生著有博士论文《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分析了近代古文、今文经学之争及其文学表现形态；单正平先生的博士论文《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涉及晚清公羊学（今文经学）与历史叙事的关系；陈平原先生著有《“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载《文学评论》2003 年第 3 期），论述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新史学与“新”文学的关系，指出二者著述方式存在着的内在一致性。另外，史学界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王汎森、李孝悌诸先生关于近代学术与民族主义各种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本书也有启导的作用。本书始撰于 2006 年，终撰于 2008 年，在历时两年多的研撰过程中，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一种重要的支援力量。本书力图在整体的文学形态和文学史意义上，呈现近代学术变迁对文学发展方向、主题嬗变的调整作用，把它视为近代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动因，并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明确化、清晰化。

在理论和史料的多层面支撑互动中开展研究是一件具有诸多挑战性的事情，由于所涉领域的牵涉面比较广，本著的研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对于近代学术和文学以及近代学人及其创作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继续深挖。对于学术影响文学的方式、形态还可以进一步地丰富化、丰满化。部分内容的论述还需要逻辑和史实的更为绵密的相互支撑，史料的搭建也还有待于继续进行“采铜于山”的工作。如此种种，或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工作了。

第一章 “新史学”与历史小说的中国图景

从清初文史大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意图提高“史学的身价”^①，把中国凝固僵化的文化思想导引到实际的中国“历史”层面上来，到清末梁启超推翻“旧史学”提倡“新史学”，把中国的历史叙述从“朝廷”（君相，所谓君史）落实到“社会”（国家，所谓国史）、“民间”（国民，所谓民史），不仅隐伏了一段长达近300年的中国学术文化“由道返器”、“道不离器”的务实走向，也表明在晚清民族危亡的时刻，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必然开始的一种以“革命”的方式，在叙事的层面重构民族历史的强烈冲动。在晚清史学观层面开始的这一段“史界革命”，其重点在于摒除“一朝一姓之所由”的“君史”，而去演述“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的“民史”^②，使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体，其目的实与在近代的意义上谋求“构筑我们的国家”的雄心密切相关。在1896年的文章《变法通议·历史》中，梁启超就注意到“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必须借重“世界史”的叙述。因此，对于中国史家而言，要“养国民之精神，发扬其爱国心”，必须从翻阅他国历史的“隔岸观火”的尴尬中摆脱出来，自著历史以“抉中国之病原”，洞悉“国民发达之次第”及“民族之变迁”，从而发挥“国民教育之精神，

①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② 梁启超：《论译书》，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莫急于本国之历史”^①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和著史观念是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相关论述相一致的，而他看重历史叙述的“史笔明畅飞动”，尤其是历史叙述向着中国“一城一乡之教养”的“日常生活世界”打开，在一开始就为他的历史叙述链接上了文学性。他在《新小说》杂志首推“历史小说”，也打开了以“小说”进入“历史”世界的门径，催生了用小说叙述历史，以“小说”代替“史记”的新的文学局面。可以说，在这一思维之下，晚清的新小说家都是不同程度地带着新的历史意识开始文学创作的，小说地位的提升也是因为其中越来越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国族意识”和“纪实存史”的自觉考量——新小说家们不仅要重视“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②的学理论述，也要为之添加“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的史家意识和“种教之感情”的近代民族情愫^③。以“小说”代替“史记”的写作策略，既反映了新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家国观念的醒悟与自觉，也反映了清末小说的叙事重心从传统的对社会人心的道德训诫，转向以“争存”、“图新”为中心意识的家国关怀，以及民族情感的发掘与再现。

① 梁启超：《东籍月旦·历史》，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4页。

② 邱炜菱：《菽园赘谈·小说》，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③ 参见鸿都百炼生（刘鹗）《〈老残游记〉自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在这篇文章中，刘鹗明确地把自己的小说自许为近似“《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

第一节 想象空间的开创：《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

——一个经典的个案

1902年，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从第1期开始发表《新史学》，赋予新史学“团结国民”、“进化群治”的重大使命，并断言“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单刀直入把史界革命推向其提倡民族主义的前台；同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同样以革命家的豪情，主张“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②，意在通过小说界革命来维新国民、创新国家。对于梁启超这一年郑重其事办的两件大事，学界历来采取“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态度，而对其“双水并流”、若有会意的勾连缺乏敏感。事实上，发表《新史学》和创办《新小说》并非两个单列的事件：准备将民族主义在中华大地催化成“相与呼应如潮然”的梁启超，有意实践其“文学亦学术思想所凭借以表见者”^③的主张，把新史学视为“思想之进路”，把新小说视为“心理之感召”^④，其用意正在于使新小说成为推进民族主义学说的利器，发挥族群认同的感召作用。因此，从“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密切相关”出发，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提倡“新小说”，

① 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②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其合力即在于推行民族主义。在文学的一面，二者的互动颇为有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在发表《新史学》时推出新小说，反映了梁启超把“小说”当做“历史”教科书的思想启蒙策略，使得近代小说的地位进一步提升；②新史学与新小说追求共通的叙述“书法”，新小说在“文章学”的意义上被推上文学之最上乘；③二者共同开创的“想象空间”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但在新史未出、史学不振的当时，梁启超更为重视小说的想象魔力，遂使新小说承担更大的民族建构责任，开辟了一条从学术思想到文学想象的独特思路。

一、把“小说”当做“历史”教科书

时人谈及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大多把这一文学上的创举与《新民说》紧密相联，众口咻咻，演成一条公例。然而此说尚有未尽全者。其视野的盲点即在于对当时梁启超“著史”情怀的忽视。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说，他在1901至1902年间，一直勉力“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其事未果，于是又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遭铎之一助”^①。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新史学》应是《中国通史》的总纲、体例与中心思想的揭示，它与《新民说》及《新小说》均有内在的联系。《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文学主张，实又与《新史学》“团结国民”、“进化群治”的立国思想密切相关。《新小说》首推“历史小说”，“专以历史上事

^①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页。